

謝靈運詩集



273

谢灵运论稿

钟优民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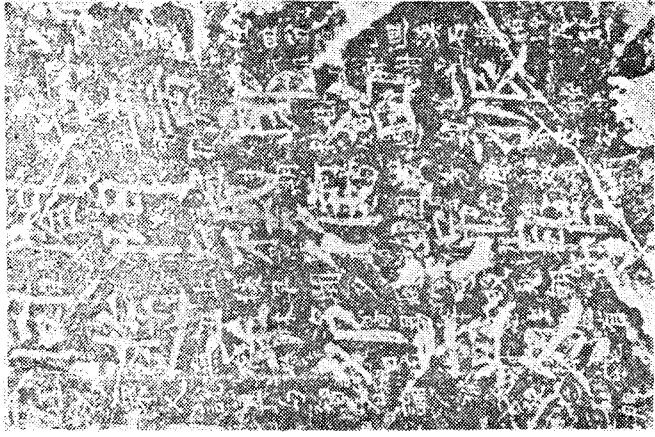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32开 8.625印张 3插页 192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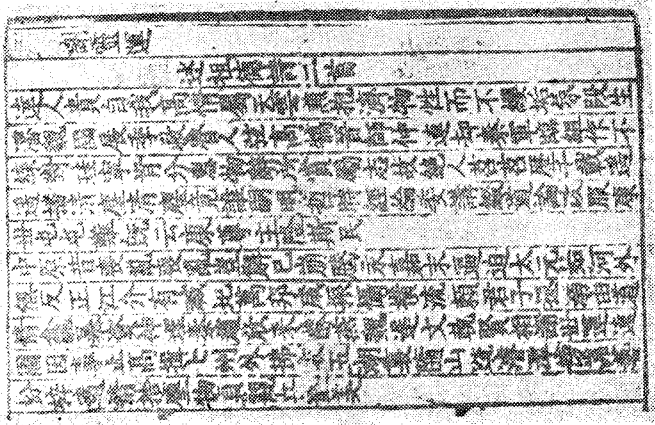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

书号 10206·135 定价 1.75 元





《石门新营所住》诗石刻拓本



宋嘉泰年间宣城刻本《三谢诗》

目 录

晋末宋初的社会面貌·····	1
谢灵运的家世·····	20
谢灵运的经历·····	32
谢灵运的哲学思想·····	54
谢灵运的爱国思想·····	79
谢灵运的隐逸思想·····	102
谢灵运的山水诗·····	121
谢灵运的咏怀诗·····	157
谢灵运的赋与文·····	201
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	237
后 记 ·····	272

晋末宋初的社会面貌

谢灵运生于公元385年(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卒于公元433年(宋文帝元嘉十年)。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晋末宋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动荡时代,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中国北方长期四分五裂,政权更迭频繁,鲜卑、匈奴、羯、氐、羌(史称“五胡”)等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相互角逐,混战不休,社会极不安定。东晋末年,北中国实力最强的是氏族苻氏建立的、以长安为都城的前秦王国。公元357年苻坚继位后,对内采取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措施,对外积极扩张;东灭前燕,吞并黄河下游中原地带;西南方面侵占晋的梁州、益州(今湖北北部、西部和四川);西灭前凉,控制河西(今甘肃西部);北吞拓跋鲜卑族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建立的代,暂时统一了北方。苻坚从此自恃强大,进而想吞并东晋,于是迫不及待地在公元383年倾全力发动对南方的进犯,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次南北战争的结果,与战争发动者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苻坚大败,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北中国继续出现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原本是晋师北伐的大好机会,但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极大地削弱了收复中原的斗争力

量。尔后刘裕的几次北伐，虽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战果，平南燕，灭后秦；却终因其称帝心切，仓卒南归，致使大夏赫连勃勃乘机于公元418年击溃其留守长安的晋军。关中一带又得而复失，重新沦于胡族铁蹄之下。割据地方的群雄继续混战。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乘时崛起，在逐鹿战争中逐渐壮大，并积极准备对南方发动进犯。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一死，魏明元帝立即举兵渡河南侵，夺取了刘宋大片土地。公元424年，魏太武帝继位，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北方各军阀势力上，到公元439年灭北凉，黄河流域再次得到统一。这段时期，北中国广大人民在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残暴统治下，遭受着巨大的灾难与痛苦。群雄争霸，交战各方大量屠杀俘虏的事屡见不鲜：魏太武帝俘获慕容宝军四五万人，在参合阪一次杀死；大夏首领经常率兵四出抢掠，成千上万地杀害战俘与平民，打败南凉时，一次就杀死几万人，并把人头堆集一处，号曰“髑髅台”。在交战过程中，各族反动统治者还穷凶极恶地驱迫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奔临前敌，让本民族骑兵在后督战，其残暴狠毒，亘古罕见。在这种深重的民族压迫下，汉族人民“思晋”的民族情绪一直十分强烈，晋师的历次北伐都得到他们热诚的拥护与支持；胡人政权对南方的侵扰，都遭到他们不同方式的抵制与反对。这也正是淝水之战中前秦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有这些，无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北中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东晋末年，中国南方为司马氏小王朝所统治，政治腐败，社会十分黑暗。皇帝是整天烧香拜佛、酒醉昏迷的孝武帝，当权者是贪污腐化的司马道子父子，吏治大坏：“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晋书·孝武帝纪》）广

大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挣扎度日，苦不堪言。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士族制度，到晋末宋初更有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当时的高门大族，大量侵占良田山泽，把社会财富尽可能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挥霍浪费，尽情享受。他们经常利用其统治者的地位，凭借封建特权巧取豪夺，恣意霸占，成为独据一方的“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宴”的土皇帝。如大地主刁逵家就是“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晋书·刁逵传》）；刁逵于隆安年间做广州刺史时，“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馀资称是”（同上），通过商业剥削大肆攫取社会财富。东晋南朝历代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对士族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往往不敢过问，所以类似这种“占夺田土”、“封略山湖”的事，一直史不绝书。“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宋书·刘穆之传》）“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宋书·百官志下》）“（颜延之）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尚书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唯利是视，轻冒陈闻，依傍诏恩，拒捍馀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宋书·颜延之传》）通过上述肆无忌惮地搜括强占的罪恶活动，使社会生产资料大都控制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他们产业殷富，财累万金，但国家赋税却落不到这些人头上，转而压到寒门小民身上。因为东晋沿袭西晋旧制，士族享有各种豁免特权，甚至依附他们的佃客，也可以不用向国家纳税，只对豪强有租课负担。这就迫使更多农民成为贵族豪门的佃户，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再加上东晋立足以来，长江上游荆州地区一直被地方割据势力把

持，东晋朝廷的费用进而集中落到三吴人民的头上，造成赋税激增。太元二年朝廷规定，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到太元八年，就猛涨到每口税米五石（每石十斗）。除口税外，还有田税和其他各种沉重负担。就拿徭役来说，亦曾出现空前畸重的局面。依照官府规定，“东晋之制男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丁出一运丁”（《隋书·食货志》）。实际上则远远超过此数，如东晋升平（穆帝年号）年间，庾和出任丹杨尹时，即曾“表除重役六十馀事”（《晋书·庾亮传》），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猛于虎的苛政，当时统治集团里个别有识之士早就为之惶恐不安，范宁出任豫章太守前，即曾上疏大声疾呼：“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晋书·范宁传》）东晋政府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榨取，加上地方豪强肆行兼并、残酷剥削的结果，促使社会上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足无立锥之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民终于点燃起愤怒的烈火，这就是隆安三年（公元399）爆发的晋末农民大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司马元显为了扩充个人实力，征调江南诸郡从奴隶身分解放出来的佃客入伍：“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晋书·会稽王道子传》）由于征调佃客损害了一部分地主的利益，因而一些失势的南北大族也乘机参加起义队伍，企图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如这次

起义的领导人孙恩、卢循，都是失势的北方大族，但起义斗争的主力仍是对东晋士族门阀的反动统治具有刻骨阶级仇恨的农民群众。这次历时十二载、活动遍及当时南方主要地区的农民革命，给东晋王朝以沉重打击，使之濒于名存实亡的绝境，对推动历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怒潮，残暴的反动统治集团进行血腥的镇压，官军所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的灾难。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战后江南很多地区疮痍满目，一片凄凉景象：“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邻近的荆州，损失亦复惨重异常：“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频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或越缚应召。”（《宋书·武帝纪》）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使江南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地主阶级又在广大农村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继续从事疯狂掠夺、残酷剥削的活动：“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炆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羊玄保传》）士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并未因农民起义或晋宋易代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东晋末年“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馀处，僮仆千人”的谢混家，其本人虽因党附刘毅被刘裕所杀，其家业到刘宋初年却依然“室宇修整，仓廩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宋书·谢弘微传》）。而农民群众所承受的租税负担照常是有增无减，到刘宋时期，甚至

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富饶的江南，照旧是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的地狱，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劳动群众的反抗彼伏此起，前仆后继，而且参加斗争的人数很多，规模甚大。如景平元年（公元423）有富阳孙法光、孙法亮等人领导的起义。元嘉初年有浙川、丹川的少数民族起义。元嘉九年（公元432）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参加者十多万人，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普遍和尖锐。

晋末宋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在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东晋政权最初是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又有江南士族参加而建立起来的，皇室和士族之间历来就是既相互利用而又相互争夺的关系。东晋末年，接连几个皇帝皆昏庸无能，哀帝司马丕迷信神仙，“不识万机”；废帝司马奕“终日酣畅，耽于内宠”；简文帝司马昱“幼而岐嶷，即位后拱默取道，常惧废黜”；安帝司马德宗“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

（皆见《晋书》本纪）。他们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已完全变成傀儡，大权旁落，号令威权多出于士族出身的强臣，皇室与士族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晋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末衅，桓玄借运乘时，加以先父之业，因基革命，人无异心。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

（《宋书·武帝纪》）司马氏皇室为了取得士族的支持以苟延

残喘，对豪族势力一般都采取放纵宽容的政策，致使“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同上），士族地主从而得以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门阀士族又都担任郡、县的官吏，除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外，同时掌握着强大的政治权力。司马氏朝廷为了保障中央财政赋税收入，曾经几次试行“土断”，企图使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向国家纳税服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终因豪族势力的顽强抵抗，“土断”之法总是未能实行到底。这种改革的流产生动地反映出代表皇室利益的中央政权和代表士族利益的地方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其次，南迁的北方士族之间、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东晋的士族分为侨姓和吴姓，侨姓系北方迁来，吴姓为南方土著。士族大都是地主，但并非所有的主都是士族，非士族的地主被列入庶族或寒门。当时士庶之别甚严，门户之见特别厉害。南渡之初，吴姓目北来的侨姓为“荒伧”（鄙贱者之称，犹言壮夫）。晋宋易代以后，在南的侨姓逐渐同化于江南土著，亦随而目宋以后南渡之北人为“荒伧”。东晋南朝的上层统治者皆是以世家士族为主体的庞大官僚集团。士族集团之间相互倾轧到尖锐化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各派军阀之间的逐鹿战争。东晋中叶以后桓温家族与谢安、王坦之两大家族之间的较量，司马道子父子的垄断朝政，排挤有权势的士族，引起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兴师问罪，进而发展为桓玄的倒晋自立，最后以刘裕吞灭诸雄、导演“禅让”喜剧而告终，开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初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具体表现为刘裕死后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残酷倾轧，先是权臣徐羨之、傅亮、谢晦集团废杀少帝刘义符，并杀刘裕次子义真而立

三子义隆，是为宋文帝；不久，文帝又杀徐、傅、谢三人，集大权于己身。所有这些，说明晋末宋初政局的极不稳定。当权者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准备北伐、收复中原和改革朝政、发展经济这些事关民族命运、人民生计的重大问题上，而是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从事种种阴谋活动，严重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晋末宋初，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展开了尖锐的争论。社会思潮的活跃与当时尚未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自然很有关系。秦汉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儒学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魏晋以后，儒学渐趋衰微，但最高统治者从维护王权的需要出发，多半仍以儒学为正统思想。当时胡人统治下的北中国，各统治集团为了笼络汉族人民，也都比较注意提倡和保护儒学。北魏继五胡之后，儒学最为兴盛：“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

（《魏书·儒林传》）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也曾有过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努力，但收效不大：“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晋书·儒林传序》）儒学的支配地位既已丧失，经师在社会上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晋书·徐邈传》）虽然如此，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不能低估，它主要保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里。如

东晋名儒范宣“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歿，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他在江州地区提倡儒家经学，影响很大：“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晋书·范宣传》）刘裕做了皇帝后，同样不忘宣扬儒教：“制规作训，阐校修经，礼乐已甄，云雨未弘。”（谢灵运《武帝诔》）刘宋初年，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朝廷大臣纷纷提倡儒学，傅亮在《立学诏》里即曾详细陈述恢复学校的极端重要：“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芜，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今王略远覃，华域清晏，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被儒宫，弘振国学。”（《艺文类聚》卷三十八）魏晋以来，儒学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巩固专制政权，历来皆很重视三礼之学，两晋南朝儒学中最发达的也数三礼之学，仅《晋书》、《梁书》的《儒林传》里的三十一人中，就有十九人擅长礼学，并多有著述传世。儒家的天命说在这个时期也有新的发展。西晋人伪造并托名战国时列御寇所作的《列子》就极力否定人力、宣扬天命，给那些乐天安命、自我陶醉的人们提供理论根据，认为人的穷达寿夭皆天命注定，不可更易，完全是维护门阀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反动说教。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很多唯物主义者都是以儒家的

面貌出现的，但他们多未能摆脱天命论的束缚。

当时与儒学共存并在上层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是门阀贵族的思想意识——玄学。西晋玄风大盛，是促成西晋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永嘉南渡以后，东晋朝廷大多数显要名流，并不去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清算玄学的流毒，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庾亮等就甚喜清谈，常常“共谈析理”，深夜不散。到会稽王司马昱（公元320——372）当权时，清谈玄学更发展到顶峰。他不但自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晋书·简文帝纪》），而且还搜罗一批清谈家集聚在自己周围，优渥有加。当时清谈名家殷浩、刘惔、王蒙、孙盛、韩伯、许询等与之过从甚密，据《世说新语》记载：“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赏誉篇》）清谈之盛，竟使某些佛门高僧也跟着钻研老庄之学，且所获甚为可观。如慧远既长于般若，又“善老庄”；支遁（字道林）对《庄子·逍遥游》有深入的研究：“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世说新语·文学篇》）当时一些儒学大师也颇受此风影响，兼通玄学，如一向标榜自己“言谈不及《老》、《庄》”的范宣，当别人问他“人生与沈俱生”出自何处时，就能毫不犹豫地答称“出《庄子·至乐篇》”。清谈玄言之风，一直到刘宋时代，未见衰减。宋文帝曾经将羊玄保两个儿子取名为“咸”、“粲”，勉励他们继承“林下正始馀风”。按曹魏时阮咸为“竹林七贤”之一，以旷达不拘礼法出

名，另有荀粲也以“尚玄远”著称于世。宋文帝立四学，玄学并列为四科之一。当时朝廷权贵何尚之、何偃、王球、王微等，都是著名的清谈家，他们互相吹捧，王球称美“尚之西河之风不坠”，何回报“球正始之风尚在”。从这里不难看出刘宋统治集团如何大力提倡玄学以及很多士大夫身上玄学气味的至为浓厚。

道教是继承秦汉以来的神仙家的衣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老子被其宗奉为教主。东晋葛洪（公元284——363）是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创立了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新道教，以反对流行于民间的原始道教，后世道教徒奉为经典的《抱朴子》一书即出自其手。他提倡“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抱朴子·自叙》）等一整套谬说，以迎合妄图长生不死、永享人间豪华富贵的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影响很坏。在东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士人，信仰其说、实践其事者，大有人在。北魏寇谦之（公元？——448）也是当时的著名道士，他篡改民间流行的五斗米道，提出“专以礼度为首”的、为统治阶级效劳的新道教，很得魏太武帝的支持与赏识。往后，道教在刘宋时代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陶弘景（公元456——536）把神仙分成许多等级的《真灵位业图》一书的问世，其本质是为人世间分别富贵贫贱寻找宗教根据，以迎合世俗地主的需要，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新的理论根据。

时代的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这一切都是传播宗教的良好土壤。道教之外，佛教在晋末宋初亦有很大的发展。晋末好几个皇帝都信仰浮屠之学，简文帝亲临佛殿听经，孝武帝立精舍（僧徒讲道说法之所）于殿

内，引诸沙门居之。东晋皇室、朝廷权贵和社会名士里面，很多人信奉佛教，热心佛寺建筑，历史上著名的东林、道场、瓦官、长干诸寺，皆成于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此，桓玄曾下令裁减淘汰僧侣，并痛陈佛教伤风败俗，祸国殃民之弊：“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匱，名器为之秽黷。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与僚属沙汰僧众教》）恰中时弊，不为虚语。东晋佛教中心为庐山和建康（今江苏南京）两地，代表人物为慧远（公元334—416）、佛罗跋陀罗（公元359—429），佛教寺院有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刘宋时期，佛教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宋文帝接受何尚之关于佛教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建议：“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雅颂之兴，理宜倍速，既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弘明集》卷十一《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刘义隆深明佛教教义对人民群众的麻醉作用，故其极为重视佛教。元嘉年间京师营造佛寺几达高潮，刘宋一代佛寺增至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增至三万六千人。刘宋皇室供养很多僧侣，仅南郡王刘义宣就养有“尼媪数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不少社会名流与佛门僧人交往密切，辩论佛理，往复终日，传为佛教史上的佳话。佛门大兴土木，必然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从而引起一些关心人民疾苦的政治家的激烈反对：“宋明帝起湘宫寺，曰：‘此是大功德。’”